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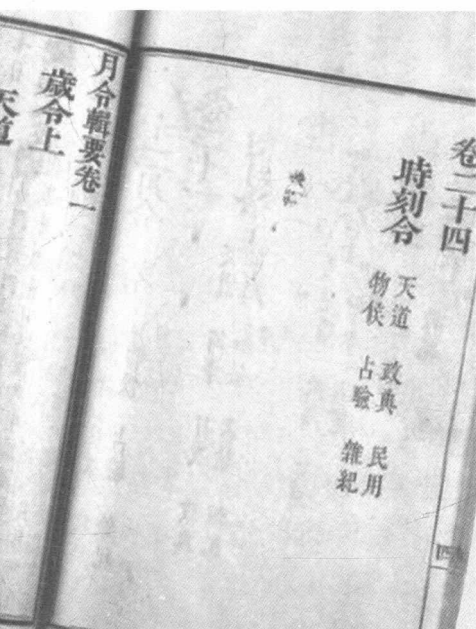
早期中国的月令与 “政治时间”

薛梦潇 著



早期中国的月令与 “政治时间”

薛梦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 / 薛梦潇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325-8931-9

I. ①早… II. ①薛… III. ①年号—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6962 号

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

薛梦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45,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8931-9

K·2523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早期中国的月令与‘神圣时间’研究”（16YJC770033）资助。

目 录

序论	1
第一章 月令文本的形成	16
第一节 观象察时与揆时施教	17
一、上古中国的时节意识	17
二、《左传》中的“时”与“不时”	24
三、《国语》中的“先王之教”	30
第二节 早期中国的月令文本	33
第二章 战国秦汉月令文献整合	55
第一节 “五音”配置所见齐、楚月令源流	55
一、“五音”配置及其原理	56
二、同源异流：楚月令与齐月令	66
第二节 《吕纪》成篇与“齐月令”的胜利	70
一、五行系统	71
二、月政时禁	72
三、灾异与嘉祥	73
四、物候变“化”	74
第三节 《月令》入《礼》	79
第三章 层累的“明堂”	96
第一节 周公故事中的“明堂”	97

2 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

一、“周公朝诸侯于明堂”	98
二、“宗祀文王于明堂”	104
第二节 《考工记》“周人明堂”形制复原	110
第三节 “明堂月令”与汉代明堂礼	117
一、汶上明堂	118
二、长安明堂	120
三、洛阳明堂	124
第四节 从太庙听朔到明堂授时	127
一、《礼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考辨	127
二、秦汉授时礼仪空间变迁	130
第四章 从“迎四时”到“五郊迎气”	137
第一节 月令文献中的“迎四时”	138
一、《月令》“迎四时”	138
二、《轻重己》与银雀山汉简《迎四时》	139
第二节 汉代的迎气礼	142
一、王莽的迎气礼创制	143
二、从《月令》与“元始故事”再出发：东汉的五郊迎气	146
第五章 汉代的“行县”与“行春”	156
第一节 行县·行春·班春	157
一、“行县”“行春”举类	157
二、西汉末年的“班春”	163
第二节 “行春”与东汉地方统治	166
一、行春劝农，富之教之	167
二、帝国威仪的展示与体认	168
三、授民以时	170
第三节 “行春”的理论渊源	172
一、《月令》与“行春”的成立	173

二、“行春”的名与实	177
第六章 东汉的行刑时间	182
第一节 秦与西汉的行刑时间	184
第二节 东汉“元和改律”	187
一、“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187
二、“元和改律”的序曲	190
第三节 礼乐兴则刑罚中：“元和改律”前后的制礼作乐	197
一、四分历颁行与受命改制理想	198
二、复兴礼乐与政治新起点	200
第四节 “永元改律”始末	202
一、“麦秋”案薄刑	202
二、论者的驳异	204
结语	212
附录：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	220
一、从纪“日”到“年月日”的确立：殷周纪时法变迁	222
二、“四时”的出现与大事纪岁	227
三、万里一朔：秦汉帝国的时间大一统	238
结论	246
参考文献	248
后记	263

序 论

月令,是中国古代的时宪之书。它以时月为纲,使农事、礼乐、政教、兵刑贴合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律。以“月令”为题的文献,收录于《小戴礼记》之中。不过,早期中国的时宪之书文本众多,不唯《礼记·月令》一篇。载于《大戴礼记》的《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首”(下文简称《吕纪》),以及《淮南子·时则训》等传世文献,都具备“以月系事”的特征。它们也是“月令”。

《管子》中的《玄宫》《幼官》《七臣七主》《轻重己》诸篇,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五令》《四时令》,北京大学藏汉简《节》《阴阳家言》等出土文献,以四时、八节或五行为纲,没有选择“四时—十二月”的时节系统,也就未按以月系事的体例编写。严格地说,它们不能算作“月”令。但是,这些文献用时节、五行来配伍政令的做法,与月令并无本质区别;它们关于时节忌宜的叙述,也多为后世月令所承袭。职是之故,本书也将《管子·玄宫》等篇纳入“月令”范畴考察。

诸本月令结构或繁或简,内容有详有略。《夏小正》相对简单,主要记录每月星象和物候。在所有月令文献中,它是最显“原始”的一种。《吕纪》《淮南子·时则训》与《礼记·月令》三篇内容基本相同,先设当月五行配置,次述天子政令、礼事,再书违令灾异警示人君,纲目具张,篇章结构与思想最成系统,当出自同源。《管子》中的月令文献,基本属于“五行时令”,但各篇结构与文字并不统一,文本来源复杂,出于众手的痕迹明显。

这些月令文献也不成于一时。《夏小正》的历法最为古老。《史记·夏本纪》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①虽以“夏”为名,但不太可

^① 《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能是夏代遗书。从所记天文星象等因素推测,《夏小正》的成书时间,大约在西周至春秋末年之间。《管子》一书托名管仲,但其中几篇月令文献应在战国中期才成立。《吕纪》的年代,争议较少。^① 嬴政即位后,相国吕不韦召集宾客,使人人著其所闻,乃成《吕氏春秋》。^② 然则,《吕纪》的主体内容诞生于在秦统一天下之前。西汉景帝时期,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著书,武帝初年献于朝廷。《淮南子·时则训》的成篇时间亦不难框定。《时则训》与《吕纪》内容近似,其中有根据汉代制度改写的几条文字,可见是汉初之作。

天南地北气候不齐,春秋战国诸侯林立的现实,又塑造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各月令文献天象、物候的差别,正是作者站在各自地域观察记录的结果。自然环境相殊,遂导致月政时禁上的因地制宜。《夏小正》的作者可能是居住在黄河中上游夏墟的人,《管子》《吕纪》反映的则是黄河下游青州地区的知识系统。

总之,上揭月令文献体例有别,文字相异,成书时间有先后,出身地域也不一。它们展示了早期中国多样化的“时间表”设计方案。欲探求上古先民的时间观念、时节意识,月令文献是上佳的切入点。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框架。《淮南子·齐俗训》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③ 空间具有可视性,土地、山陵、墙垣、坛场、宫室都可以构筑起一定范围的空间。时间却没有触感,人们只能通过天文、气象、人物生死、代际更新等媒介,来体会时间的推移。胡塞尔一语中的,他说:“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世界时间的实存,不是一个事物延续的实

① 梁玉绳据《史记·吕不韦列传》以“八览”居首、“十二纪”居末,且因世称“吕览”,提出今《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首,似非本书序次。毕沅反驳梁氏之说,认为自《汉书·艺文志》以来皆以“吕氏春秋”为正名,而“十二纪”之伦类与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梁玉绳后亦修正己说,同意“十二纪”居首的观点。今人岛邦男仍按《史记》之载,认为“十二纪”居末,且今本“十二纪”已非原始面貌。参看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页;岛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1年,第57—74页。

②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

③ 高诱:《淮南子注》卷一一,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8页。

存,以及如此等等,而是显现的时间、显现的延续本身。”^①这就引出了时间与人类活动的联系。

时间可分为“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自然时间是不受人控制的客观存在,是天文物理学层面可被测量的对象。而社会时间不具有自然时间那样均质齐一、单向运动的特性。因为人的参与,等量的时间长度,可能显示出不等量、不同质的社会意义。^② 社会学家的研究已经意识到,作为秩序原则,作为社会协调、规范和定位的工具,作为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概念组织符号,时间是由社会活动构成的,时间在实践中得以表达,“所有时间都是社会时间”。^③ 简言之,社会时间是一种人为再造的时间体系。

人类日常生活中面对和感受的时间,都是社会时间。一些看似更接近于自然时间的概念,其实也是人为设置的时间秩序。例如,要把握十二个朔望月的总天数,当然需要“科学”观测与计算,但将意为谷物成熟的“年”字为 355 日的时间长度命名,便立即将自然时间转化为人类活动的周期。再如,殷商时代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西周晚期才进一步细分为春夏秋冬四时。夏与冬的出现,并不是被测算出来的,而是被“安排”进去的。就月令文献而言,无论是“四时—十二月”系统,抑或“五行—三十时”系统,也都是在自然时间基础上作人为划分。

月令自出现之日起,它的持有者、使用者往往被设定为人君或天子。各本月令文献的时节划分,也不是单纯地因循自然时间规律,而是寄托着对王道政治的追求。以《吕纪》《月令》为例,秋冬与春夏,无尊卑之别,但有阴阳之分。设计者将王政的宽和柔惠,融入草木萌发、玄鸟于飞的勃勃生气之中,而又期望人君挟恃秋霜冬雪,行威武肃穆之政。将四时十二月

①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② 参看皮蒂里姆·索罗金、罗伯特·默顿:《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收入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③ 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金梦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53页。

配以五行,赋予每时每月生、养、衰、杀的哲学思想,制订出助阳顺阴的政令和礼事,于是,这些针对君主而人为规定的各具政治寓意的时间,就成为“政治时间”。当然,“政治时间”也是社会时间的一种,也不仅仅通过月令表现出来。纪年符号(如唯王某年、元鼎某年等)及一些特殊的日期时刻(如日冬至朔旦),都不是工具性的时间,它们也是具有政治象征与威权意涵的“政治时间”。

月令呈现出的是具有周期性的“政治时间表”。如上述,先秦时期月令文本多样,意味着“政治时间表”非唯一种。战国后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区域间文化上的竞争与交融也未曾停歇。帝国诞生前夜,《吕氏春秋》问世。从这部巨著“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气魄可见,^①秦人对天下的统一,并不局限于将六国纳入帝国版图,也有吞吐古今之学、融会人心思想的志望。《吕纪》自然也不乏将各自为政的战国时间整合为帝国时间的意图。

倚靠强权,《吕纪》这一份政治时间表,确立了“王官月令”的独尊地位。然而,整合不等于消灭。《夏小正》与《管子》中诸篇月令文献的内容和设想,就不同程度地被《吕纪》接收。与此同时,地域性的月令文献在秦汉之际仍在本区域内流行。《管子》的部分内容被改造成为“王官月令”,而那些落选的文字和思想,在西汉前期的山东银雀山汉简、北大藏西汉竹书中尚斑斑可见。

汉兴七十余年后,战国余绪殆尽,地域性的月令文本不可避免地退出政治舞台。西汉中期以降,《吕纪》《月令》一系不仅坐稳了“王官月令”之席,而且伴随着儒生与方士合流,完成了由阴阳家言到儒学经典的转身。几乎同时,《月令》对汉代政治文化的渗透也日益深入。

月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西汉末年就已展开。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年间,汉廷征召天下“有图讖、钟律、月令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随后“正乖缪,壹异说”。^②从此,自季汉至清末,关于月令文献源流与月令礼制的研究不断丰富。

①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9页。

考镜源流是历代月令研究者的兴趣所在。《礼记·月令》作为儒家经典,其成书年代与文献源流最受学者重视。蔡邕撰《月令章句》,开篇即称《月令》乃周公所作。^① 东汉贾逵、马融、王肃亦有相同观点。直至清代,仍有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持此看法。针对“周公说”,为《礼记·月令》作注的郑玄提出该篇乃礼家抄合秦人《吕纪》而成。孔颖达《礼记正义》维护郑注,并牖陈文字、官名、岁首和服色等证据,阐明《月令》出自《吕纪》的结论。

郑玄、孔颖达的注疏,因其为官方经学观点而影响甚巨。除此之外,古代学者也有其他不同看法。杨宽整理前人学说,概括为六种:(1)周代说。以贾逵、马融、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和黄以周等人为代表。(2)秦代说。以郑玄和高诱为代表。(3)束皙依据《月令》采用“夏正”的情况,主张《月令》成书于夏代。(4)隋代牛弘认为《月令》杂虞夏商周之法。(5)方以智提出《月令》因袭《夏小正》,而《吕纪》抄自《月令》。(6)汪鋈、崔适等认为《月令》本周、秦时代之书,并经过汉人修改而成。^② 以上六说基本涵盖了经学时代的学者对月令文献源流的认识。

走出经学时代以后,月令文献源流仍是研究焦点之一。顾颉刚从明堂、历法和“五帝”系统的生成史,推断《月令》全篇文字皆王莽时所作。他认为《吕氏春秋》也并非原貌,而是被王莽和刘歆等人加以利用,将“十二纪”改置于“八览”和“六论”之前,又将新作之文拆散冠于“十二纪”之首,同时还将此文分别录入《淮南子》《逸周书》,成为《时则训》和《月令解》,最终东汉马融将《月令》编入《礼记》,即名之为《月令》。^③

顾颉刚一派之外,一些学者仍主张《月令》的成书时代不会晚至西汉末。容肇祖认为《月令》出自战国阴阳家之手,是邹衍遗作。^④ 向宗鲁《月令章句疏证叙录》指出,《月令》即《明堂月令》,本周代之书,后经损益增删。^⑤ 上揭杨宽《月令考》对前说一一辩驳,然后提出新见:《礼记·月令》

①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貳),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918页。

② 杨宽:《月令考》,收入氏著《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3—473页。

③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3—204页。

④ 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第97—107页。

⑤ 向宗鲁:《月令章句疏证叙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46—47页。

的作者当为晋人后裔,其书与西周时期的《七月》、春秋时期的《夏小正》一脉相承,是战国末期阴阳家的作品。郭沫若《管子集校》认为《管子·玄宫》是《吕纪》的雏形。^① 胡家聪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并进而推测《吕纪》成书时间的上限不早于《玄宫》,下限则在公元前 239 年之前。^② 徐复观亦认为《吕纪》成书与邹衍学派直接相关,并叙述了由《夏小正》到《吕纪》的发展演变轨迹。^③

20 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学界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町田三郎《管子幼官考》与《時令說について——管子幼官篇を中心に——》两文,考察了时令说的不同形态及其成立时代。^④ 島邦男的专著《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细致梳理了月令文献的传承脉络。该著认为,月令文献是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发展而来,邹衍的后学将阴阳五行与四时相结合,作成《四时篇》收录于《管子》;在《四时篇》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幼官》《禁藏》《轻重己》等篇;今人所见《吕纪》乃东汉时成立的文献。^⑤ 金谷治《管子の研究》专门讨论了《管子》中的时令思想,分别推测了《玄宫》《禁藏》《七臣七主》等篇的成书时间及其与《吕纪》和《礼记·月令》的关系。^⑥

直至最近二十年,月令源流问题依然备受关注。陈美东认为月令出于阴阳家之手,但诸本月令又存在不同的学术传承派系。^⑦ 乐爱国发现《月令》可能出自《管子》。^⑧ 王锸同意杨宽的结论,并作了一些补充。^⑨ 王连龙提出《邹子》《明堂阴阳》等均为《周书·月令》的异名。^⑩ 刘宗迪、曾锦

① 郭沫若:《管子集校(一)》,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8—190页。

② 胡家聪:《〈管子·幼官篇〉新考——兼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139—146页。

③ 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町田三郎:《管子幼官考》,《集刊東洋學》第1辑,1959年;《時令說について——管子幼官篇を中心に——》,《東北大学教養部文科紀要》第9号,1962年,第51—63页。

⑤ 島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

⑥ 金谷治:《管子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

⑦ 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

⑧ 乐爱国:《〈管子〉与〈礼记·月令〉科学思想之比较》,《管子学刊》2005年第2期。

⑨ 王锸:《〈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古籍研究整理学刊》2006年第5期。

⑩ 王连龙:《〈周书·月令〉异名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华也通过文献对比,考察了《吕纪》《时则训》与《礼记·月令》之间的因袭关系及思想演变过程。^①

以上,经学时代的月令研究,受限于“注不破经、疏不驳注”的经学注疏原则及门户师说,难免存在误解经义和有违史实之处。近现代的月令文献源流考辨,则重在传世经史的梳理。随着简帛文献的频仍出土,可资讨论的月令文献种类日益丰富,已有研究的某些结论遂有待重新考量。

迄今已出与月令相关的简帛文献主要有:(1)长沙子弹库楚帛书;(2)临沂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类文献数种;(3)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节》《阴阳家言》;(4)居延“月令简”; (5)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

关于子弹库楚帛书的性质,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较早提出了“楚月令”的看法。^②李零评价陈梦家的这篇遗作是专门考证帛书性质内容最全面的一部作品。郭沫若认为,楚帛书是与《管子·玄宫》性质相近的文献。^③俞伟超明确表示帛书是《明堂图》性质的楚国书籍。^④曹锦炎呼应陈梦家的观点,也认为楚帛书是《礼记·月令》的滥觞。^⑤李学勤虽然认为楚帛书并不属于月令文献的范畴,但也不否认楚帛书与月令有相似之处,甚至有共同的思想渊源。^⑥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以及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楚帛书研究》,综合并细致梳理了前人工作,翔实论述了楚帛书与《管子·玄宫》等月令文献的关系。专著重新绘制了已佚的《管子·玄宫图》,以之与楚帛书比较,发现二者虽然性质相近,但区别也很明显:楚帛书属于历忌之书,而月令就是从历忌之书发展而来的系统更复杂的文献。^⑦

① 刘宗迪:《古代月令文献的源流》,《节日研究》第2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曾锦华:《〈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淮南子·时则训〉及〈礼记·月令〉之比较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② 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④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⑤ 曹锦炎:《楚帛书〈月令〉篇考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⑥ 李学勤:《楚帛书研究》,见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62页。

⑦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楚帛书研究》(十一种),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

银雀山汉简《迎四时》《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三十时》《四时令》《五令》等篇，内容与传世月令文献相似。李零将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与《管子》所揭三十时节进行对比，判断二者均属于“五行时令”系统，但在形式与细节上也有区别。^① 这些研究揭示了月令文献不同系统之间及每个系统内部的复杂性。陈侃理根据《皇览》中一段完整的迎气礼文，缀合原本残泐已甚的银简《迎四时》。他指出《迎四时》在内容上存在与《月令》相似之处，并注意到儒术对阴阳书的吸收有一个不断选择、淘汰的过程。^②

中国西北地区也出土了数枚月令简牍，包括：居延汉简 95·5 与 210·35、居延新简 E.P.T.4: 16、E.P.T.59: 62、63 及 E.P.T.65: 173，等等。这些简牍主要是西汉末至东汉初的遗物，虽然不是成篇的月令文献，但对研究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线索。陈直和森鹿三都已经注意到，几枝新莽简的月份和政令配置与《月令》存在错位，由是可以确认王莽改汉正朔的史实。^③

同样在中国西北，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月令诏条》完整揭示了元始五年(5)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月令原貌。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对内容进行了考释。^④ 魏启鹏《敦煌悬泉〈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校笺》指出了月令诏条在文献上的重要性。^⑤ 黄人二《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与研究》，对诏书内容进行校读注解，继而考察了诏书的形成与传递过程，以及政治与经学之间的关联。^⑥

“日书”是先秦、秦汉时期另一种与时间有关的文献。睡虎地、九店、

① 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收入氏著《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 陈侃理：《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辑。

③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④ 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见《敦煌悬泉月令诏条》“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⑤ 魏启鹏：《敦煌悬泉〈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校笺》，收入《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⑥ 黄人二：《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周家台、放马滩、孔家坡所出简牍中均可见此类文献。已有学者注意到“日书”与“月令”之间的关系。刘信芳的研究表明,楚帛书的十二章题记兼具“月令”与“日书”的性质。^① 蒲慕州在《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中专门提到,月令与日书都是人们日常行事的准则,具有相似的宇宙观,区别在于使用者的身份上。^② 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一文考察了月令与日书用途上的相关性,揭示了“月讳”与“日禁”之间的文本层次。^③ 孔家坡汉简《日书·岁》是一篇颇不同于其他“日书”的出土文献。刘乐贤、晏昌贵均就该篇文献性质展开论述。^④ 刘乐贤认为,《岁》与楚帛书有着相似的主题,可能是属于《阴阳五行时令》《四时五行经》一类的阴阳家文献。晏昌贵则注意到《通志》将谭融所作《日书》三卷归入“礼类”的“续月令”之下,揭示出《日书·岁》篇与月令之间的文献学关联。此外,出土月令简牍的综合性研究并不多见。目力所及,似只有刘梦娇的《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内容》全面探讨了出土法律类文书、银雀山汉简与秦汉日书中的时令。^⑤

简帛文献的出土与考古发现的增多,扩充了月令文献的种类。这些新材料对月令研究的助益,不仅在于提供了更多的月令文献样貌,而且催生了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

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即已揭示月令具有“政令”的性质。自汉代开始,月令逐渐从纸上遗文转变为现实制度。王梦鸥《读“月令”》是较早的关于月令与汉代制度的研究。^⑥ 在出土文献不断丰富时代,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研究完全具有突破和创获的可

① 刘信芳:《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祇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1994年。

②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③ 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

④ 刘乐贤:《孔家坡汉简〈日书〉“岁”篇初探》,见氏著《战国秦汉简帛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晏昌贵:《孔家坡汉简〈日书·岁〉篇五行配音及相关问题》,收入氏著《简帛数学与历史地理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⑤ 刘梦娇:《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内容》,《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⑥ 王梦鸥:《读“月令”》,《“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1期,1970年。

能性。月令与秦汉地方统治是颇受学界关注的议题。1959年,武威磨咀子M18出土“王杖十简”。陈梦家将其与“养老令”联系起来考察,提到仲秋养老本于月令古制。^① 同样关于养老,赵凯考察了汉代“行糜粥”之制,注意到月令政治化所引发的养老政策调整及其效果。^② 除此之外,藤田胜久《漢代の地方統治と時令思想》指出,《月令》只列举了需要遵守的项目,却没有记载对不遵守者的罚则,故月令只是教化时应该遵守的项目。^③ 最近,刘鸣的博士学位论文《月令与秦汉时间秩序》从汉代月令灾异论、汉匈战争的季节及大赦时间规律等多方面,考察月令对两汉政治的影响力。^④

邢义田与杨振红先后发表的专题论文,综合运用了出土文献与传世史料,是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月令研究成果。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与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均从释读尹湾汉简《集簿》“以春令成户”一句切入,继而就“汉家月令”的内容及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深刻探讨。对于杨振红提出的质疑,邢义田又撰写了《月令与西汉政治——重读尹湾牍“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一文予以回应,在重申原先观点的同时,也对旧文作了检讨和补正。杨振红的论文在收入专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时,另增“附笔”部分,列举《后汉书》中的多条史料,用以说明东汉时期月令对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⑤

在法制史领域,月令与法令、政令的关系是又一大研究视角。馬場理惠子结合西汉皇帝诏敕,对“月令”的“令”作了律令层面的考察,研究认为整个汉代经历了从时令思想向皇帝法令发展完善的过程。^⑥ 于振波也指

① 陈梦家:《王杖十简考释》,收入《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

② 赵凯:《西汉“受鬻法”探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③ 藤田勝久:《漢代の地方統治と時令思想》,见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郡県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

④ 刘鸣:《月令与秦汉时间秩序》,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⑤ 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月令与西汉政治——重读尹湾牍“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原载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⑥ 馬場理惠子:《“主四時”と月令》,《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7,2006年;《“時”の法令——前漢月令攷》,《史窓》64,2007年。